

彭燕郊与“诗苑译林”丛书

陈璐

(长沙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系,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彭燕郊以诗人著称,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艺组织者”,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诗苑译林”丛书即是最初、也最为重要的一种。相关工作因公布的相关材料较少,一般读者不知其详,久之则有被遮蔽、被遗忘之势。这也使得相关史实有待钩沉、辨析与补充,以细描彭燕郊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诗学构想与人生际遇。“诗苑译林”丛书在中断 20 年之后重新出版,再次凸显出彭燕郊当初文学活动的意义。

[关键词]彭燕郊;“诗苑译林”;诗学构想;史实钩沉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0)04-0103-08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0.04.013

Peng Yanjiao and the Series of "Translated Poetry"

CHEN Lu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Peng Yanjiao is famous for a poet and an important "organizer of literary art", who has done a lot in translating, introducing and publishing foreign literary works, among which the series of "Translated Poetry" is the first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ne. Due to the lack of relevant materials published, the general readers cannot get the details of relevant works, which may result in the tendency to be covered and forgotten after a long time. Accordingly this makes it necessary to clarify, analyze and supplement the relevant historical facts to present in detail Peng'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ts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his poetic conception and life experience. The series of "Translated Poetry" was republished after a 20-year hiatus, which once again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Peng Yanjiao's original literary activities.

Key words: Peng Yanjiao; translated poetry; poetic conception; historical facts

彭燕郊以诗人著称,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艺组织者”^{[1](P82)},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出版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诗歌写作通过各类报刊与诗集即可窥见大致的面貌,而关于文艺

组织方面的材料则是散落各处,非仔细钩沉、连续,不足以呈现其整体情状。1980—1990 年代,彭燕郊所进行的“文艺组织”工作大致包括“诗苑译林”“散文译丛”“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

收稿日期:2020-06-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4YJC75100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55D750002);长沙理工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计划项目(219QJCZ086)

作者简介:陈璐(1976—),女,湖南岳阳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和《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外国诗辞典》等,其身份包括筹划、组稿、主编等不同形式。相关出版物并不难找见,但公之于众的“文艺组织”方面的相关材料较少,一般读者无从窥见,由此而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随着时代衍进、世事变迁,相关工作即有被遮蔽、被遗忘之势。彭燕郊于2008年离世之后,与其“相识相交近六十年”、长期在湖南出版界工作的李冰封在悼念文中特别谈到了“诗苑译林”丛书:“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五四以来,中国当代诗歌出版史上的重要史实。而这件事的首创者,乃是一代诗人彭燕郊。”^[2]这番呼吁即显示了当事人对于历史情势的感知。本文旨在以彭燕郊所操持的“诗苑译林”丛书为中心,对相关史实予以钩沉、辨析与补充,以细描彭燕郊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诗学构想与人生际遇。

一、“诗苑译林”丛书的缘起与主要出版物

“诗苑译林”丛书筹划之际,李冰封时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为译文室的主管领导,后来还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对该丛书的出版无疑是非常熟悉的。其对于彭燕郊与“诗苑译林”丛书的回忆大致包含了两个层次,首先是关于彭燕郊提出的相关想法以及出版社的反应:

大约是在1980年,彭燕郊兄先找了当时担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的黎维新兄,说建议出版一套译诗的丛书,要概括五四以来外国主要名诗人的诗和中国的名译。老黎要我找我,因为当时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分工管五个编辑室,刚成立不久的译文室是其中的一个。于是,他就找了我。记得谈了“五四”以来,在新文学领域中,译诗是个很薄弱的环节,这也影响了我国新诗的发展。但也有译得好的,比如,冰心、梁宗岱、戴望舒等人,要重印他们的旧译。还谈了介绍外国诗要介绍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如,介绍俄罗斯的,除了应介绍普希金、莱蒙托夫、

涅克拉索夫以外,还要介绍叶赛宁、介绍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我十分佩服他有远大的眼光,于是,建议他还去找当时译文室主任夏敬文同志(还介绍了夏敬文1947年在武汉大学搞学生运动的经历,并说明他现在思想也开放)和译文室的两位台柱:杨德豫兄和唐荫荪兄。他读过杨德豫兄翻译的拜伦,认为译得很好。这以后不久,译文室根据他草拟的这套丛书的书目,开会讨论了两次。我参加了他们的讨论会。讨论的情况,并由我向社长黎维新兄作了汇报^[2]。

彭燕郊后来在回忆“诗苑译林”丛书时特别提到了黎维新(1925—2015)、李冰封(1928—),“这两人和我都很熟。湖南的出版是他们两个人开拓的。他们约我搞点东西,我就想到这个”^{[3](P32-33)}。“他们约我”和李冰封所说“彭燕郊兄先找了”,措辞有些差异,但细品之下,两者的出发点都一样,即都将如此一桩在当代文化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事件归因于对方,可说是相互敬重、英雄相惜。而从上述文字所提到的人物来看,除了黎维新、李冰封两位社领导外,还有夏敬文(1920—)、杨德豫(1928—2013)、唐荫荪(1927—1996)等人。编辑或“思想也开放”,或有“译得很好”的作品,这与彭燕郊自然是多有投合之处。在一般描述之中,杨德豫作为“主持了大型外国诗歌丛书《诗苑译林》的编辑工作”^{[4](P817)}而得到更多的关注,实际上,上述诸位也都是推动“诗苑译林”丛书至关重要的人物,值得历史铭记。

杨德豫在回忆中称彭燕郊建议出版丛书的时间为“1982年初”,又称“丛书于1983年开始出版”^[5],这里所提到的时间需稍加辨析。从目前资料来看,如果说李冰封回忆中提到的“大约是在1980年”,只是一个约数的话,那么,从新见彭燕郊当时致施蛰存信来看,最迟在1981年9月,两人就建立了书信联系并就“译诗丛书”之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商讨——从中也可知丛书最初名为“译诗丛书”,彭燕郊认为,“叫‘译诗

丛书’,似乎不够味”,由此请施蛰存“代拟个名称”。及至1981年10月30日,又有“《梁宗岱译诗集》已编好”、卞之琳和孙用“对译诗丛书都很支持,很热情地提供了不少宝贵意见,也提供了一些线索”^[6]一类语句。以此来看,彭燕郊向出版社提出建议的时间可依李冰封所言,认定为1980年;彭燕郊随后所开展的工作,显然也是在出版社的授意之下进行的,至1981年底,已有译诗集编成。

至于“丛书于1983年开始出版”这一时间表述,很可能是杨德豫将他接手“诗苑译林”丛书工作的时间记为丛书最初的出版时间。^①这大致也没错,目前所见最早的、明确标注“诗苑译林”字样出版物,即1983年3月版《梁宗岱译诗集》,其装帧方式也为后来的丛书所沿袭。但其中也有一个细节需注意,李冰封回忆所提到的、被彭燕郊称誉的杨德豫所译拜伦诗选,应该是1981年8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此书最初是作为普通译诗集出版的,封面未署“诗苑译林”字样,多次印刷之后才按照“诗苑译林”的统一样式装帧,^②类似情况还包括江枫译《雪莱诗选》(1980年10月)、黄伟经译《屠格涅夫散文诗集》(1981年6月)、郑振铎译泰戈尔《新月集·飞鸟集》(1981年8月)、冰心译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1982年5月)和纪伯伦的《先知·沙与沫》(1982年7月)等。但从日后的统计来看,这些译诗集都被归入“诗苑译林”丛书之列,由此亦可见丛书最初在出版思路方面的一些情况。

其次,上述李冰封的回忆文也谈到了“诗苑译林”丛书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书目:

(一)译诗名家的专集:暂刊戴望舒、梁宗岱、徐志摩、朱湘、孙用、施蛰存、冯至、戈宝权等人。(二)各国诗选:如《英国诗选》、《苏格兰诗选》、《法国七人诗选》、《俄国诗选》、《苏联抒情诗选》、《古希腊抒情诗选》、《印度古诗选》、《日本古典俳句选》等。(三)各国杰出诗人的诗歌选集,如,弥尔顿、布莱克、司各特、拜伦、雪莱、

霍思曼(以上英国),雨果(法国),里尔克(德国),普希金、莱蒙托夫、谢甫琴科、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勃洛克、叶赛宁、叶夫图申科、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古米廖夫等(以上俄罗斯及乌克兰……),狄金森(美国),聂鲁达(智利),泰戈尔(印度),纪伯伦(黎巴嫩)等。(四)现、当代各国诗选,如,《美国现代诗选》、《法国现代诗选》、《德语国家现代诗选》、《北欧现代诗选》、《西班牙现代诗选》、《美国当代诗选》、《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日本当代诗选》等。

翻译以上名诗的名家,除上列已出版译诗集的各位名家外,还包括:冰心、卞之琳、罗念生、郑振铎、金克木、沈宝基、周煦良、王佐良、赵瑞蕪、杨苡、查良铮(穆旦)、杨德豫、绿原、屠岸、江枫、林林、方平、袁可嘉、郑敏、魏荒弩、陈敬容、北岛、王央乐、吕同六、罗洛、申奥、邹绛……^[2]

李冰封以历史回顾的眼光视之,从中可知丛书的大略——他也指明上述书目并非一开始就全部列出,而是多次讨论的结果,但从最早明确标注“诗苑译林”字样的《梁宗岱译诗集》来看,书目预告即已达到36种,可见当时已有宏大的计划。丛书的出版总量,杨德豫称“共出版51种”^[5]。不过根据出版预告及其他相关材料,有必要特别指明的一个事实是,限于出版能力,未能出版的译诗集应该也不少,比如,叶汝璉所译《法国当代诗选》(已见出版预告)、袁可嘉所译《叶芝诗选》等。^①

对于“诗苑译林”丛书当时的总体发展而言,可分为两个阶段,即湖南人民出版社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两个不同的出版主体。杨德豫回忆称:“(丛书)1990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移交给湖南文艺出版社继续出版”,“1992年我奉命离休,这套丛书也就终止运作了”^[5]。个中的具体细节,限于资料,暂无法获知。大致情形即是如此,前后有十余年。前一阶段时间较长,后一阶段较短,似有草草收尾之势,其中部分为稍早时

期译诗集的重印。比照两个阶段出版物的封面,前者简洁、典雅,后者则增加了色彩和形象的元素,装帧思路有由雅而趋俗之势,这一变化大抵也可说是显示了1990年代前后出版社对于市场因素的主动应对。

但对彭燕郊而言,1980年代中期,他与出版社之间出现了某种裂痕,个中缘由,他本人认为是人事方面的原因。大致情形是,当时某位领导看中一部译稿,译者本人较早就已去世。彭燕郊表示每本译诗集都有统一的体例,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译者序”,要找一个人来写,“书要慢一点出”。不想,这么处理引得领导“大发脾气”,并且谈到“这个前言里边为什么要提彭燕郊啊,我们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又不是湘潭大学的出版社。结果他就把前言去掉了,后面出的那十几本都没有前言了”^{[3](P33)}。因为这一波折,此后丛书的选目与出版工作,彭燕郊的参与程度无疑会受到影响。

这自然还只是一面之辞,但其中所提到的“前言”倒是一个观察角度,较早时的“诗苑译林”丛书,其前言有一小段感谢语:“特别要感谢湘潭大学彭燕郊教授,他在这套丛书的规划、组稿、审校等工作上,都曾付出过辛勤的劳动。”^{[7](P2)}彭燕郊非出版社人,“规划、组稿、审校等工作”,显示了出版社对其工作性质的界定。而仔细翻阅各出版物,取消前言的时间大致在1986年初,最后的一本应该是这一年2月出版、由曹明伦翻译的司各特的《湖上夫人》。

不过,此后的译本虽然取消了前言,但也不难判断其与彭燕郊的紧密关系:一方面,仍有不少译者在“译序”一类文字中表达了对彭燕郊的感谢;另一方面,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来看,此后所出版的多数译本,应该都是源于彭燕郊的组稿,译者与其保持了比较多的联系,典型的例子有《朱湘译诗集》(洪振国整理、加注,1986年5月)、《苏格兰诗选》(王佐良译,1986年5月)、《西班牙现代诗选》(王央乐译,1987年2月)、《日本当代诗选》(孙铤译,1987年7月)、《美国当代诗选》(郑敏译,1987年9月)、

《域外诗抄》(施蛰存译,1987年10月)、《俄国诗选》(魏荒弩译,1988年1月)、《译诗百篇》(孙用译,1988年10月)、《北欧现代诗选》(北岛译,1988年12月)、《请向内心走去——德语国家现代诗选》(绿原译,1988年12月)等。

这其中的曲折,一般读者自是无从知晓。而从熟知当时情形的当事人的回忆来看,此等细节亦被略过,而将“诗苑译林”丛书的主要功绩归于彭燕郊,即如杨德豫所指出的:彭燕郊是该丛书的“‘精神领袖’或‘社外主编’,业绩斐然,功不可没”^[5]。很显然,当事人看到了彭燕郊之于诗歌史、文化史的更为宽广的意义,并且相信:“《诗苑译林》丛书的广大读者,以及更广大的外国诗歌爱好者,都会对彭燕郊教授怀有历久不渝的敬意和谢意。”^[5]

二、彭燕郊的诗学构想与人生际遇

黎维新的纪念文谈到,彭燕郊在筹划“诗苑译林”丛书时“不计个人名利”,也谈到他“富有远见和开拓精神”,意识到了五四以来诗歌事业的发展有过“一段严重的脱节”,而“当务之急”是出版译诗丛书,“以取其精华,繁荣我国新时期的诗歌创作,并促进对外文化交流”^[8]。李冰封也指出,彭燕郊当时认为,五四以来,“译诗是个很薄弱的环节”,又称彭燕郊“有远大的眼光”,“介绍外国诗要介绍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在今日看来,这都可视作是新时期之初彭燕郊在世界诗歌历史和新诗发展方面独特的识见。更确切地说,其“远大的眼光”一方面表现在对于历史的熟稔,另一方面是他对当时诗歌发展局势的判断。

彭燕郊其实并不通外语,但有足够多的资料表明,他对于现代翻译总体状况的熟悉程度远在一般人之上——很多“在一般人的视野之外”的译作,他都能如数家珍。宽阔的视野是基于此,寻找、联系译者的烦恼也是基于此。如果说,译诗丛书最初的打算是涵括“五四以来外国主要名诗人的诗和中国的名译”,那么,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与相关译界人士的联系日益深

入,构想越来越庞大,标准也由有“名”而趋向“重要”之势,即如彭燕郊1981年10月30日给译界前辈施蛰存的信中所谈:“诗苑译林”丛书“除了总结‘五四’以来译诗成果外,也得努力组织力量译那些必要译而至今未译的重要作品,出版那些应出版而未出、或未认真出版过的名译佳作。”^[6]

所谓“组织力量”,其实主要就是彭燕郊在与出版社“达成了共识”之后(黎维新语),个人联系各路译者,并且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与卞之琳、施蛰存、梁宗岱等译界前辈探讨。对于并非从事译介工作、且已年逾花甲的彭燕郊而言,此一工作着实是有着特别的难度:其一,不少译界前辈已是古稀之年,精神状态与身体状况显然对翻译工作多有影响,如梁宗岱(1903年生),当时已在病中,1983年11月去世;而施蛰存(1905年生)处理《戴望舒译诗集》和个人译诗集《域外诗抄》的工作进度也比较缓慢,以致彭燕郊信中多有“你和望舒的译诗集什么时候能寄出?我希望最近就能得到”(1981年10月30日)一类急切的声音。其二,彭燕郊对于译诗状况的了解是基于“读者”的角度,当时与各路译界人士少有直接的联系——相比于梁宗岱、施蛰存、卞之琳等名家,联系那些不同语种的、名气尚且有限的译者,难度要大得多。个中情形,从彭燕郊1981—1982年间致施蛰存的信即可见一斑。如前述1981年10月30日信所示,彭燕郊请施蛰存“告诉”金克木的地址,“最好请代为介绍”——着重号均为原有,其重视且急迫的程度可见一斑;又询问“上海有没有搞法国诗翻译的同志?龙沙,还有维尼,缪塞,拉马尔丁,我想都得好好译过来。又如塔索和彼得拉克,至今没译,真太遗憾了。你看能找到合适的译者不?”^[6]毫不夸张地说,此种联系近乎滚雪球的方式,从各方获得译者信息,逐一联络,几年下来,终至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但也需看到,从彭燕郊致施蛰存信的线索来看,在其广泛联络之下,梁宗岱、朱湘、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孙用、金克木等人的译诗集得以出版,但

徐霞村以及龙沙、维尼、缪塞、拉马尔丁、塔索、彼得拉克等诗人作品的译者的联络情况如何,已无从察知。

进一步看,彭燕郊在新时期之初即敏锐地“建议出版一套译诗的丛书”,是基于他对当时诗歌发展局势的判断。他有不少相关谈论,最集中的一次见于1989年3月12日写给木斧的信,他将外国诗歌的译介置于“艺术更新”的角度来看待:

艺术更新对于我们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首先: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诗的要求,其次,我们身上的旧观念过去已经浪费了我们大部分的大好光阴,我们再不能被它拖住故步自封了。你和我一样,过去漫长的封闭岁月中我们的求知欲是被压抑到最低点的,到最后,人类文明的全部成果被宣布为“封资修”垃圾,能说我们没有受这个大文化环境,文化气氛的影响吗?改革、开放的十年来,有幸的是我自己总算慢慢的睁开眼睛了,知道该看看世界,看看自己的国家,和自己身上有些什么东西了。这样,我就既有奋发、乐观的一面,又有痛苦的反省的一面……这几年我用大部分时间编译介(绍)各国现代诗的目的也在于让大家看看到底现代诗是个什么样子,现代诗是怎样发展过来的,从中也可以比较一下到底人家有什么长处我们有什么短处。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形成我们的自信,应该是一种坚实的自信。能看到的我们的新诗的前途应该是现实的可靠的前途。起哄和胡闹是没有用的,只有甘心于默默无闻,情愿做个默默无闻的埋头苦干的人,才真正能够得到真正的诗^[9]。

如前述,1980年代中期,彭燕郊与出版社发生了某种嫌隙,实际上,其所结识的人物、其译介外国诗歌的内在理路,当时已经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大致说来,就是更年轻、更新潮、更现代。最明显的表征是《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这两种译诗丛刊的创办,前者的署名副

主编之一即彭燕郊,他在编“诗苑译林”过程之中结识了著名朦胧诗人、翻译《北欧现代诗选》的北岛。

总的来说,“诗苑译林”丛书有比较强的历史回顾的色彩,多半是前现代的世界诗歌作品,现代诗歌较少,当代诗歌更少。而译诗丛刊更具灵活性,便于刊载最新的世界诗歌作品和资讯。最被津津乐道的是1987年10月约瑟夫·布罗茨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8年10月出版的《现代世界诗坛》创刊号以60个页码的篇幅,重磅推出布罗茨基专辑,包括诗抄、《文明的孩子》、诺奖祝词、受奖演说、专题介绍文等内容。其他的如1987年3月出版的《国际诗坛》第2辑,头条为法国1986年诗歌大奖获得者弗雷诺诗选,1987年8月传播的《国际诗坛》第3辑,也有198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瓦莱·索因卡专辑。凡此,均显示了独特的即时效应——在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的时代,这种操作的迅捷性几乎可说是达到了极致。

彭燕郊给木斧写信之际,“诗苑译林”丛书的出版工作已呈式微之势——也可以说是其所操持的译介事业遭遇了多方困境。以刊载现当代外国诗歌为主的译诗丛刊先是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国际诗坛》,1987年1月出版第1辑,至1988年1月出版第四辑之后停止出版;^①转由湖南人民出版社以《现代世界诗坛》之名,于1988年10月出版第1辑至1989年8月出版第2辑之后即停刊。以此来看,彭燕郊给木斧信中提到的“过去漫长的封闭岁月中我们的求知欲是被压抑到最低点的”的说法,与黎维新的回忆相通,大致可以见出彭燕郊在不同场合有过类似的谈论;而关于“现代诗”和“新诗的前途”的谈论,实际上也可说是熔铸了1980年代中后期“现代诗”在中国出版的遭遇,“诗苑译林”丛书,有不少销量可观,如《拜伦抒情诗七十首》等,印数达40万册;《国际诗坛》第1、2辑初印为17000册,第4辑为7500册;及至《现代世界诗坛》,初印数又降至5000册,差不多一年之后所出版的第2辑,印数仅区区1870册——印

数呈现断崖式下降趋势,停刊自是必然,实际上也表征了“现代诗”在当时的某种命运。以此来看,“甘心于默默无闻,情愿做个默默无闻的埋头苦干的人”一类说法,也可说是熔铸了独特的个人境遇。

三、丛书的反响与时代的氛围

从更大的时代范畴来看,彭燕郊所构想的各类外国文学译介丛书、丛刊的出版,跟时代氛围也有着紧密的关联。

最初的、也可说是最直观的自然是与奋发有为的出版湘军的构想相契合,黎维新曾指出,“(彭燕郊)这种富有远见和开拓精神的倡议,正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出版社在突破‘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方针局限之后,也正在面向全国、面向世界,扩大出书范围,急需这方面的译著。”^[8]惟其如此,彭燕郊向出版社所提出的建议,总体构想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即得到黎维新、李冰封等老朋友的支持并得以实施。

1981年9月4日,彭燕郊在给施蛰存的信中说:“出版译诗丛书,是我开的头,给他们提的建议,开始似乎还不那么热心(这些年人们提到诗就摇头,假、大、空泛滥之后果有如此者),现在期待颇切,我也乐于帮他们‘跑跑腿’。”^[6]从中不难看出,彭燕郊最初向出版社提出“诗苑译林”丛书的出版构想之际,出版社方面有一个从“不那么热心”到“期待颇切”的过程。其时,“诗苑译林”丛书已经开始出版,大抵在组稿等方面已经呈现出可喜的态势。以此来看,前述李冰封回忆中提到的当时译文室的“讨论”,不仅仅是关于“书目”的讨论,也应该是包含了这个“刚成立不久的”译文室对于发展方向的思考。这跟前文所谈到的“诗苑译林”最初的出版思路也相对应。

来自于读者、评论家的鼓励也是可以直观感受得到的。杨德豫称“诗苑译林”为“五四以来我国第一套大型外国诗歌中译本丛书”,“这套丛书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争相购阅,也受到专家、学者、诗人、翻译家们的

普遍重视和高度赞许”^[5]。“争相购阅”的情形,可见于彭燕郊本人后来的口述,“当时的出版形势非常好,《诗苑译林》一出就卖光。一个多月出一本,不断地出,后来一共出了五六十种”;“五一路新华书店天没亮就有人排队,排很长的队,一开门呢,一下子就抢光,‘请你们明天早些来,’工作人员就这么说。那个时候啊,人们精神饥饿的时间太长了。”^{[3](P32)}“精神饥饿”一词,又一次显示了彭燕郊对于当时情势的判断。

杨德豫同时还列举了1983—1991年间的一些“读者和专家对于《诗苑译林》的评语”,包括马文通(香港)、萧乾、丁白墨(读者)、袁可嘉、施颖洲(菲律宾)、施蛰存、戈宝权等人,出处则包括香港版《大公报》《中国文学年鉴》《世界文学》等重要书刊。这里引述其中的两条:一是1984年《中国出版年鉴》如是写道:“《诗苑译林》是……一套规模比较宏大,内容比较完整,包罗诗歌流派比较丰富的外国诗歌翻译丛书。……丛书的编辑出版,一方面,是对‘五四’以来外国诗歌译介成果的一次回顾和总结;另一方面,它还将填补外国诗歌译介工作若干方面的空白,使这一工作做得更加系统,更加全面,更加多样化,不但为广大诗歌读者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也为全国诗歌研究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提供重要的资料。”二是施蛰存的评价——见于1989年7月28日他给杨德豫的信:“‘五四’运动以后,译诗出版物最少,《诗苑译林》出到现在,发表译诗数量,已超过一九一九至一九七九年所出译诗总数。”^[5]

两种评语指明了“诗苑译林”丛书总量大,工作系统而全面,兼有“回顾和总结”历史、填补“空白”的双重效应。实际上,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取,那就是庞大的译者群体。毫不夸张地说,如前述李冰封文所列,“诗苑译林”丛书囊括了五四以来最为重要的数十位诗歌翻译者,“这些书名和人名组成的辉煌阵容,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用时髦的话说,这是一支全明星阵容的诗歌汉译‘梦之队’”^[10]。其中,除了少数译者如郑振铎、戴望舒、朱湘、徐志摩、查良铮

(穆旦)等人已故世外,多数译者还健在,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虽不便说是全部,但彭燕郊与其中的大部分译者都保持了或短或长的联络,正如前文所讨论的,这是以一种滚雪球的方式逐渐建立起一个庞大的译者队伍,彭燕郊非出版中人,长沙地处当时文化尚不发达的中部,湖南人民出版社也未必有多大名气,以今日项目化的眼光视之,这着实“是难以想象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正是1980年代的时代氛围之所在。在经历了“漫长的封闭岁月”之后,很多“老同志”——比彭燕郊更年长的如罗念生、施蛰存、卞之琳,同辈人如绿原、袁可嘉、王佐良、郑敏等,无不有着强烈的工作干劲,这对彭燕郊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激励,令其总有“时间不够”之感。典型的状态可见于1984年11月27日彭燕郊从北京给陈耀球信中的描述:“二十二日晚抵京后,从第二天起即处于紧张的‘满城跑’状态中”,“是业务上的联系,北京老同志太多,每天至多看二人,总是感到时间不够”^[11]。当然,更年轻一代译者所给予的鼓励也是显在的,北岛曾回忆1985年彭燕郊筹划《国际诗坛》的交往情形,“为此他常到北京,挤在我们只有两小间卧室的家里。当时没有任何资助,连路费都是他自己掏的。他四处约稿,从早到晚坐在我家昏暗的灯光下读稿写信”^[12]。其间或有文学修饰之语,但基本形象当无疑义。

对于彭燕郊本人而言,经由“诗苑译林”等外国诗歌丛书、丛刊的筹划、组稿乃至主编工作,接触更多的文学界、翻译界的人士,这也是一个身份廓大的过程。彭燕郊一般被视为“七月派”“胡风分子”,偏于革命、左翼一类,与各路人士有更多交往,使其成为一个具有更普遍的文化意义的“文艺组织者”。同时,研读更多外国诗歌、特别是现代主义诗歌,对其诗艺也是一个淬炼的过程,新时期以来,彭燕郊的诗歌写作中始终保持开放的眼光和探索的精神,人称“衰年变法”,甚至有“彭燕郊现象”之说^[13],这无疑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凡此,也可以见出时代语境之于个人的独特效应。

四、未结之语

1991年,“诗苑译林”丛书荣获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这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但历史的讽喻也在这里——获奖似乎也是某种终结,根据杨德豫的回忆,1992年自己奉命离休,“诗苑译林”丛书“也就终止运作了”^[5]。

2012年——在中断二十年、彭燕郊离世已有四年的时刻,湖南文艺出版社开始重启“诗苑译林”丛书的出版工作。首辑为五种六本,其中《拜伦诗选》(杨德豫译)、《爱伦·坡诗集》(曹明伦译)、《图像与花朵》([法]波德莱尔著,陈敬容译)为重印,上下两册《叶芝诗选》名为新书,但实际上也可视作当初所积累的稿子,^⑤仅《狄兰·托马斯诗选》(韦白译)为全新的译著。随后,也有少量为旧译重印,如《勃朗宁夫妇爱情诗选》(方平、飞白、汪晴译)等,但更多的都是新书,如《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达尔维什诗选》(2016年)、《在水中热爱火焰:安德拉德诗选》(2017年)、《尘世以上的爱情》([俄]米拉·洛赫维茨卡娅著,汪剑钊译,2018年)、《安魂曲》(阿赫玛托娃著,曾思艺译,2018年)等。丛书的接续、历史的回顾,^⑥再次将“诗苑译林”丛书这一“涵盖广,质量高,影响深远”“中国当代诗歌翻译上最重要的里程碑”^[12]推上了历史的前台,而这也再次凸显出彭燕郊当初文学活动的意义,也意味着彭燕郊当年未尽的道路又在本土出版社的引领之下继续前进,尽管随着文化普及、“艺术更新”,翻译诗歌不再是阅读风向之所在。

[注释]

- ① 杨德豫因病住院,1982年10月出院后“才接手这套丛书的编纂任务”,这一点也可以得到前述李冰封的回忆文的佐证。
- ② 从目前所见版本来看,该书至1983年6月第4次印数,

仍为普通封面;至1984年9月第5次印刷,为“诗苑译林”丛书统一装帧,累计印数334500册。

- ③ 杨婉指出共计划出版75种,并列出了详细书目,见《1980年代的“诗苑译林”丛书研究——以序跋为中心》,西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 ④ 如彭燕郊本人所谈到,他所主编《国际诗坛》仅出4期,但该刊随后还另出了两辑,署“总第5辑”“总第6辑”,看起来是出版社的行为,跟彭燕郊已无关联。
- ⑤ 袁可嘉在1990年1月12日致彭燕郊的信中曾谈到这部译诗集,见易彬、黄园辑:《彭燕郊所存文艺界人士书信选辑》,《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3期。
- ⑥ 参见徐小芳:《〈诗苑译林〉的前世今生》,《文艺报》,2013年1月14日;舒晋瑜:《三十年诗意图香相——“诗苑译林”丛书的往事新生》,《中华读书报》,2013年2月6日。

[参考文献]

- [1] 梅志.致彭燕郊(1985/12/26)[A]//梅志彭燕郊来往书信全编[M].晓风,龚旭东,整理辑注.郑州:海燕出版社,2012.
- [2] 李冰封.彭燕郊与《诗苑译林》及《散文译丛》——哀悼一代诗人彭燕郊[J].新文学史料,2008(4):17-20.
- [3] 易彬.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M].彭燕郊,口述.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
- [4] 林煌天,主编.中国翻译词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 [5] 杨德豫.彭燕郊教授与《诗苑译林》[J].芙蓉,2008(6).
- [6] 易彬.新时期以来翻译出版事业的见证——关于施蛰存与彭燕郊通信的初步考察[J].扬子江评论,2017(3):35-49.
- [7]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诗苑译林”出版前言[A]//梁宗岱.梁宗岱译诗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 [8] 黎维新.一个出版人对彭燕郊先生的怀念[J].芙蓉,2008(6).
- [9] 易彬.晚年彭燕郊的文化身份与文化抉择——以书信为中心的讨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3):18-32.
- [10] 徐小芳.《诗苑译林》的前世今生[N].文艺报,2013-01-14.
- [11] 易彬,以敏.彭燕郊、陈耀球书信选辑[J].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7(1):133-145.
- [12] 北岛.悼念彭燕郊先生[J].芙蓉,2008(6).
- [13] 韩作荣.彭燕郊现象[J].扬子江诗刊,2012(4):28-32.